



上海论坛论文与演讲精选集
复旦发展研究院丛书



亚洲的智慧： 多元文明的统一与发展

袁堂军 张 怡 主编



上海论坛论文与演讲精选集
复旦发展研究院丛书

亚洲的智慧： 多元文明的统一与发展

袁堂军 张 怡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的智慧:多元文明的统一与发展/袁堂军、张怡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9-10479-0

I. 亚… II. 袁… III. 亚洲-研究-文集 IV. D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9444 号

亚洲的智慧:多元文明的统一与发展

袁堂军 张 怡 主编

责任编辑/马晓俊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4 字数 223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79-0/D·670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海论坛2013论文精选集”编委会

主 任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朱之文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丛 书 主 编

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

委员（以姓氏字母为序）

陈诗一 陈寅章 侯杨方 华 民

姜义华 敬义佳 李良荣 彭希哲

任 远 孙立坚 钱 序 孙笑侠

宋恩荣 吴力波 吴心伯 张中祥

主 编

袁堂军 张 怡

执行编辑

丁常昕

编 辑

罗 倩 赵信敏 黄 昊 沈婵婧

卷首语

2013年,对于全球经济、亚洲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来说是暗流涌动的一年。2008年危机后,国际经济局势出现新的趋势,以美国为主导的 TPP 协议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国经济新一轮的改革序幕已经拉开,欧洲处于危机调整后的触底阶段,能否顺利复苏还有待观望,美国经济通过几轮的放量宽松显现出回暖的迹象,然而金砖等新兴国家在新的国际分工的再调整中却表现得并不理想。回顾过去一年亚洲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变动,我们发现在这一个经济联系十分紧密的区域,地缘摩擦几乎达到了二战后最为激烈的程度,这不仅妨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分工格局的再调整。特别是近年来,WTO 多边交涉陷入僵局的同时,双边以及区域主义自贸区的蓬勃发展已然成为潮流。目前在全球范围中已实施的自贸区已达 350 多个,虽然我国已签署并实施的自贸协定也有 10 来个,但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重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尚未达成协议。

导致自由贸易区迅猛发展以及区域主义多边化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但其中 WTO 多边谈判陷入僵局,以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国际分工的深化,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两个因素。首先,随着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模,贸易规则逐渐趋向从传统的以降低“边境壁垒”(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自由化,扩展到强调以降低“境内壁垒”(非关税壁垒的国内规制)为主的多方位的贸易自由化。然而,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在 WTO 成员中形成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多方阵营的博弈和对峙局面,最终导致“多哈谈判”在各方寻求贸易保护方面无法达成一致,而陷于僵局。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以

跨国企业为中心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除了商品贸易外,国际投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劳工政策以及基础设施供给等各方面的制度设计越来越重要。为突破既有规则与体制方面的约束,客观上也要求出台新的规则,因此越来越多的 WTO 成员转而寻求新的途径来实现多哈谈判未能达成的目标。2008 年金融危机后选择双边和多边 FTA 的国家蔚然成风,也是寄希望借助自贸区 and 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行本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

区域一体化可以分为两个侧面,一是以产业分工形成的跨国界生产网络为焦点的经济一体化,二是以政府之间国际协约缔结为主的制度一体化。前者主要体现在以零部件和原材料为主的中间品贸易的迅猛发展。我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东亚各国在产业间和产业内,进而在产品的制造环节间的分工体系都处于不断深化之中。这种跨越国境的生产网络的形成首先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产业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动态表现。运输手段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模块化生产方式的普及等也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助长了这一网络的形成。而推动生产网络形成的主体是企业活动,特别是多国籍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通过合理整合各国资源构建其生产与流通系统的同时,促进了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发展。2008 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显示出处于价值链中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产业互补和关联十分紧密,合则双方得利,而分则同时受损。因此,可以预见在上述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双边以及区域自贸区的建设,无疑可大大促进上述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不仅是我国,也是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然而,与欧盟和北美地区相比较,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亚洲地区的区域 FTA、EPA 的缔结显得步履蹒跚,体现出经济一体化先行,而制度一体化滞后的特征。这种现状对于亚洲和我国来说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一般而言,在经济一体化为先导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往往会受到生产网络的影响。换言之,亚洲 FTA 的推进与发展的关键必须取决于其是否与该地区跨国企业的利益和发展战略一致。从经济利益出发,有利于推动 FTA 的发展,这可以成为我国继续对外开放的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跨国公司的利益定位与参与国的国家利益定位往往不尽相同,如何克服非经济因素带来的障碍和困难,需要参与双方更高层次的制度合作。

因此,要实现亚洲区域一体化,需要从经济和非经济的两个方面着手推进。

首先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充分发挥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所形成亚洲生产网络的功能,在精准分析亚洲各国各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可以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状态,形成多层次的 FTA。这样不仅可以追求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赢利点,还可以聚点为面,为在适当的时候形成或加入更高层次的经贸协定,赢得制度改革和调整的时间。特别是中国,作为亚洲生产网络的核心,在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战略时,不仅要考虑全球及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变化对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影响,也还要考虑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全球及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影响,承担起大国责任,通过建立利益交换机制,主动参与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追求对外开放过程的帕雷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换言之,以追求合作利益为目标,最大限度地保证亚洲区域的合作各方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收益。

其次,最重要的是构建亚洲共同的价值观突破非经济障碍。亚洲各国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等存在很大的不同,多元文明以及多歧制度,导致亚洲区域作为整体的制度一体化推进十分缓慢,我们可以看到 2010 年以后亚洲区域内部出现的一些区域经济合作,无论是成员国数,还是制度安排都显得错综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亚洲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属于亚洲的共同价值观。因此,除了基于价值链分工合作的经济利益之外,如何突破文化、宗教、制度不同的障碍,构建清晰的亚洲共同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多元文明的统一,是需要发挥各国的智慧和共同努力的。2013 年上海论坛,500 余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代表齐聚复旦,围绕“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就政治、金融、政治、法律、城市、社会、环境、能源等领域通过形式多样的分论坛研讨会、圆桌会议等,就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如何实现亚洲崛起,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与深入的智慧交融,并取得共识认为,“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增强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是推动亚洲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亚洲需要通过自身的智慧,增强集体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加积极地推动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在多元和多歧中创造和谐的关键是和平共存、合作共赢、共享发展。

本次论坛汇集的论文主要聚焦在以下领域:“增长奇迹之后的亚洲:困境、挑

战与选择”、“没有安全资产世界经济靠什么复苏”、“新形势下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路径和政策”、“亚洲智慧：化解纷争之道”、“亚洲法律智慧的多元性与统一化”、“以亚洲智慧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创新驱动和亚洲城市发展”、“如何保障亚洲四十亿人的健康”、“崛起的亚洲可再生能源：从新技术、新产业走向新市场”、“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人类关注的焦点”。这些论文汇集作者的智慧和辛劳，从历史的角度，国际比较的角度以及案例分析等多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十分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和建议，限于篇幅我们仅能从中精选出一部分分别编辑为中英文论文精选集以飨读者，如果能对读者在思考亚洲发展诸问题有些许帮助的话，将会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袁堂军

2014年3月

目 录

Contents

1	第1章	亚洲和平发展的区域特征与理论诠释	李 文
8	第2章	多元文明的良性互动：“3+3+2” ——中国国际大战略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思路刍议	姜义华
16	第3章	论“东亚现代性”思潮	章益国
28	第4章	全球治理理念与儒家思想及和谐世界理念之关系	叶 江
41	第5章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东亚智慧	何爱国、宋 奇
54	第6章	多极化趋势下的中日美三国关系	王少普
63	第7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评析	贾 浩
85	第8章	东北亚合作的“小”、“易”、“简”的解决方案 ——海洋名称命名与东北亚合作机制	苏俊燮
91	第9章	中国与周边关系：困境与出路	曹云华、刘 鹏
98	第10章	中国“伙伴外交”的经验、问题与出路	张慧智
111	第11章	建构“共享共治共有”概念的“东亚航线共同体” ——以天下观取代主权观的纷争解决之道	张启雄
124	第12章	“和”为上，“合”为贵 ——现在及未来中日关系的最佳选择	胡德坤

亚洲的智慧：多元文明的统一与发展

130	第 13 章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预测与国际比较	李雪松、娄峰、刘妍、张荣霞
149	第 14 章	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改革议程	杨雪冬
157	第 15 章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战略实践创新 ——现代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张鸿雁
170	第 16 章	广州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六普的实证	李志刚
190	第 17 章	全球贸易圈与东亚经济联合：现状、演化及前景	殷晓鹏
199	第 18 章	关于亚洲合作的一个倡议	何传启

第1章 亚洲和平发展的区域特征与理论诠释

李 文^①

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的发展、稳定与和平之间持续呈现良性互动关系。经济发展优先地位的确立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福祉的相应提升,以及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增强,对亚洲国家国内和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起到了重要的缓解、缓和与抑制作用,而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稳定与和平,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自二战结束至今,西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稳定与和平是与发达、富裕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是以人类自身的相互剥削、压迫、欺凌和无情的杀戮为代价的。亚洲的独特之处在于:发展是稳定发展,崛起是和平崛起。伴随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向亚洲的转移,亚洲国家为人类社会完成从动乱、战争到稳定、和平的重大历史转折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引言

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和平与稳定的趋势愈加明显。首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动了多场战争,包括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爆发的美伊战争、2011年爆发的利比亚战争,等等,但在世界范围内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西欧和北美洲甚至进入了拥有较长时间和平地区的行列。其次,尽管在克罗地亚、也门、安哥拉、阿富汗和索马里等国,都发生过内战和军阀混战,在西亚、北非地区,利比亚、舒利

^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

亚、埃及等国家都出现了动荡,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状况得到持续,许多拉美国家内乱频繁的状况也有所改变。

亚洲在世界和平和稳定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冷战结束以来,虽然亚洲有些国家经常受恐怖主义的袭扰,有些国家国内经常发生骚乱和社会分裂,但程度相对轻微。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稳定。自1990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以来,除了泰国与柬埔寨曾因有关柏威夏寺的归属问题发生过小规模冲突外,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没有发生过国家间的战争,成为冷战后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和平地区之一。在南亚,除了1999年在印控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爆发的卡吉尔边境冲突外,迄今也未曾发生过国家与国家之间较大规模的战争。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主要国家之间也没有发生战争,使亚洲成为西欧和北美之外的又一个特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思想界、学术界对战争与和平、稳定与冲突这些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稳定论”、“核武恐怖平衡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贸易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这些学说和理论虽对解释亚洲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启发价值,但也明显存在局限与不足。亚洲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和现代化完全可以做到在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高速推进;共同拥有核武器的确是大国之间不敢轻易开战的根本原因,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一些地区发生了许多战争,但亚洲大部分地区却始终处于相对和平状态;殖民主义理论适用于二战爆发前的世界,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蓬勃开展,殖民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贸易和平论难以对二次世界大战中相互杀戮的国家之间存在较强的贸易联系这一事实提供较为充分的说明;民主和平论则难以解释冷战结束后亚洲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为何没有发生战争这一问题。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冷战结束以后,鉴于核武器的存在降低了大规模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①,许多国家将经济发展而不是安全放在优先地位,并在最大限度上

^① 1984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将纷繁复杂的世界现象明确概括为两大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做到内政和外交以服从经济发展需要为准则;为了给自由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与环境,这些国家对内重视社会与政治稳定,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或选择有限度的政治民主,对外强调和平与合作,尽量避免对立与冲突,从而使这一地区发展、稳定与和平三者关系进入良性互动。

二、亚洲国家发展和稳定之间呈现高度关联性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亚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先后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内政治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性日渐增强。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规模的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几乎都与高度的政治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经济高速增长持续的时间越长,政治社会稳定与变革的基础就越牢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社会稳定的情况就越好。相反,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出现长期停滞,政治社会也会相应地出现带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不稳定因素。

二战后初期,落后与贫穷是多数亚洲国家的共同特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并采取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的发展战略,在发展与民主、绩效和公平之间,把发展和效率作为优先选项。

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后,亚洲国家国内不同阶层日益意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和政治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走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的信念也日渐坚定。在经济持续或间断性地发展的同时,逐渐注重公平,推进政治变革,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摆脱了“民主—动乱—专制—再民主—再动乱—再专制”的恶性循环。

(一) 经济发展与对外关系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亚洲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以得到美国在安全上的庇护为前提,日本被迫接受和平宪法(不允许对抗),通过实现与西方阵营体制性对接和避免与东方阵营对抗的方式,开创了商务外交的先例;韩国通过与两大阵营国家同时交往的途径,在经济发展上完成了对朝鲜的超越;新加坡通过对国际社会的主动融入(无力对抗),完成了经济振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虽然不同程度上属于西方阵营,但在冷战期间,

为了经济发展,它们先后调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枷锁,由坚决反对转变到愿意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由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转变到对话与开放门户。

1978年,中国将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在对外关系上放弃了对抗和战争思维,致力于改善与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立场的改变,对两极格局带来强烈冲击。以此为历史转折点,亚洲由局部和平发展转变为全部的和整体的和平发展,由被动的和平发展转变为主动的和平发展,改善与别国的关系也由权宜之计转变为根本大计。

“一条强大的经济法则正在驱使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去寻求缓和与自己前敌国的紧张关系,以便使战略对手成为经济伙伴。”^①亚洲国家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为唯一尺度,以开拓市场和获取能源为根本目的,突破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亚洲和平发展的实践表明,在政治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间难以建立高度政治互信的情况下,经贸成为增进相互联系、共同获取利益,进而增进友谊的最佳突破口。政治关系通常伴随平等与不平等、支配和被支配、结盟和不结盟等复杂关系,而经贸联系却是平等的、无拘束的、无差别的。亚洲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先经济平等,后政治平等和互信的道路。

经济联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国家利益的主要交汇点。亚洲各国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和相互帮助的过程。日本和NIES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而来自日本和NIES的资金和技术,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是亚洲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发展对亚洲国家的发展具有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亚洲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引领和拉动作用,成为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将战略重心由军事安全转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的引领和帮助下,一些亚洲经济落后国家相继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为亚洲的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亚洲政治生态深刻变化,和谐和合作逐渐取代对立和对抗,亚洲国际关系逐渐呈现良性互动态势。

^① 哈里·哈丁:《亚太区域的新时代:从两极到多中心》,引自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160页。

（二）经济发展与地区合作

亚洲国家为了更好地利用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建设旨在推动和平与合作的地区组织与机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顺应冷战结束后在地区层面呈现的和平与发展大势,东盟由安全组织转换为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在东盟的带动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亚洲地区经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先后涌现了“东盟+3”、“东盟+1”、“中日韩合作”、“东亚峰会”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亚洲地区合作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的相互行为,其主要功能在于增进相互间经济的联系。中国参与亚洲地区合作,改写了历史上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以等级制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中国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参与“东盟+3”和“东亚峰会”,不以挑战和颠覆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为前提,甚至没有谋求在推动合作中的领导、主导地位,而是以普通成员国的身份参与合作,这是“中国在崛起的情况下第一次以共同、平等参与的方式来处理和邻国的关系”^①。

东盟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带来的收益有切身体会。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指出:“中国不仅致力于维护自身稳定,而且在亚太地区稳定方面不断显现使命感。东盟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显然会影响到安全,撇开贸易投资的好处不说,由经济合作而产生的互信和良好的政治愿望,可以缓解领土和地缘政治争端导致的紧张。”^②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也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经济上有助于区域的发展,在地缘政治上也有助于本区域保持稳定”^③。

在合作推进进程中建立完善的各项规范制度,对规避这一地区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具有积极作用。亚洲各种区域合作机制的参与国达成共识:区域内FTA和开放市场都须符合WTO的规范,并共同制定和遵守新的规则,包括关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规则。合作的参与方还通过发表共同声明的方式承诺通过对话的方式

^① 张蕴岭访谈录:《中国的大战略与亚洲的地区主义》,引自文正仁《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② 拉莫斯:《富有魅力的巨龙》、《菲律宾外交与发展》(英文),转引自唐世平、张洁、曹晓阳主编《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③ 《联合早报》,2001年11月7日。

处理争端,如《南中国海行为共同声明》。合作过程形成多种对话平台,如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则有利于通过对话和沟通对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未雨绸缪。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培育和扩大了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区域经济合作动力的加强,使得一系列优惠贸易协定出现,在增加相关国家的贸易机会的同时增进了共同安全感。有学者观察到:“亚洲内部的众多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发挥了安全同盟在密切国家间政治和安全联系所发挥的作用,并且表明未来将出现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改变大国之间的军事平衡,但它们改变并重新定义了影响力的平衡、安全的内涵和政治联盟。”^①

三、结论

“发展才是硬道理”,停滞不前是灾祸之源。亚洲各国内部的改革,地区国际制度的修正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国际和平的维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都应当以促进各国发展为首要目标。

2013年3月23日,访问俄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目前国际局势时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是一个重要理念。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力图通过对亚洲邻国侵略和扩张的途径发展自己,走上失败的道路;亚洲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并汲取日本的教训,认识到其他国家不能很好地发展,最终会对自身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冷战思维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是导致目前东北亚和中国南海出现紧张态势的重要原因。朝鲜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长期奉行先军政治路线,三次进行核武器试验,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一直难以缓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政治家找不到发展经济的办法,只好依靠挑衅邻国主权,与邻国为敌的方式凝聚、迎合甚至误导民意,谋取执政地位。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出于“中国的发展必然意味着自身利益的损失”的考虑,或通过挑起领土争端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麻烦,或力图趁中国还不够强大

^① 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编:《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前在领土领海上窃取更多的利益,给亚洲和平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目前,相关国家应进一步克服和摆脱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日本应认识到中国的崛起符合世界潮流,不仅是任何国家都难以阻挡的客观事实,而且能够给自身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中国应该认识到如果日本保持发展态势,可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繁荣继续做出重要贡献。两国应该在更大框架下,探究新的紧密合作的机制。

中国和日本、越南和菲律宾之间都应最大限度地、更加理智、克制地应对岛屿和领海争端,在难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创造和平谈判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将矛盾和冲突限制在“不诉诸武力”的底线之上,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国家经济得到较好发展,或出现好转后,出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政经分离在目前情况下依旧不失为上策。目前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中日韩 FTA 谈判,启动与日本的自由贸易谈判,继续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尽量通过合作利益的构建和制度化建设,让亚洲各国、尤其是存在领土、岛屿和领海争端的国家共处在一个以合作为主轴的大环境里,至少,可以把相关的关切点回到经济发展方面。